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文中子考论

李小成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 史 哲 研 究 丛 刊



文中子考论

李小成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中子考论/李小成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5

(文史哲研究丛刊)

ISBN 978 - 7 - 5325 - 4791 - 3

I. 文... II. 李... III. 文中子(584~617)—人物研究
IV. B241.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3243 号

西安文理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文史哲研究丛刊

文中子考论

李小成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 × 965 1/16 印张 17 插页 2 字数 245,000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ISBN 978—7—5325—4791—3

K · 1037 定价: 4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承印公司调换

序

尹占华

早年曾读龚自珍《己亥杂诗》，其中一首说：“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齟齬，但开风气不为师。”注解上说：隋唐之际王通居河汾间，授徒讲学，门人甚众，很多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李靖等皆出其门。但自宋代司马光以来，便不断有人对房、杜师事王通之说提出质疑，后来甚至怀疑到王通其人的有无，以至《中说》的真伪。龚自珍是相信王通之事的，并认为王通之所以遭人怀疑，是因为他的门生名气太大了，而他本人只不过是处士，由此被人怀疑他为师的资格，其实王通仅是开门讲学，并不以师道自居。自那之后，王通及其著作《中说》，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也看过《中说》，翻检过有关王通的资料，对王通及其学术思想了解得比较多了，但对于唐朝开国的诸多名公巨卿是否是其门人，仍不甚了了。

所以，当李小成说他要作关于王通的论文时，我立刻认定这是一个好题目，是值得大作一番的。关于王通与《中说》的论著虽然也出了几部，遗留问题仍然很多，特别是关于王通的家世以及弟子问题，仍然是此项研究的难点。李小成迎难而上，将主要精力放在关于王通的家世、弟子以及著作的诸多考证上，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广搜博览有关资料，进行分析论证，可以说将王通的事迹基本上搞清楚了。比如在考证王通的弟子时，将王通的弟子分为重要弟子（也可以说是关系密切的弟子）、一般弟子、交游垂询者，不仅考虑“名”也考虑“实”，兼顾名实，这样的考辨便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了。在王通的著作中，人们对《元经》的怀疑更大。李小成不仅从文献的角度说明了《元经》的确是王通所作，更重要的是他仔细研读了《元经》，考察了《元经》的记事特征与方式，从而得出结论：其中的记事与王通当时的身份与地位完全相合，但《元经》本身在史学上是毫无价值的一本书。既然如此，谁

又去伪造这样一部毫无价值的书呢？这样便从著书立说的动机上否定了王通不是《元经》作者的说法。书中《文中子新儒学出现的文化背景》一章是作者后来加上去的，肯定了王通振兴儒学的时代意义，其中颇有些发人深思之处。

李小成有着很好的先秦文献的功底，故其考证、研究儒学可说是驾轻就熟。虽然如此，他为此所下的功夫是相当大的，当时他为了搞清一个问题，不知查阅了多少文献资料，其中的甘苦他本人当是体会最为深刻的。当此《文中子考论》即将出版之际，我拉杂写了上述一些话，权作“序”，以期引起大家对文中子的兴趣。希望李小成能以文中子的研究为契机，在关于国学的研究上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2006年11月于西北师大寓所

目 录

序	尹占华 1
绪论	1
一、唐代有关文中子的文献记载	2
二、宋代的文中子研究	4
三、明清时期的文中子研究	9
四、近代以来的文中子研究	10
五、文中子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12
第一章 文中子家世考	14
第一节 文中子远祖及秦汉时的祖系	14
第二节 文中子近祖	21
第三节 文中子父及兄弟	31
第二章 文中子生平	53
第一节 文中子生卒年	53
第二节 文中子的仕历	59
第三节 文中子的隐居生活	63
第三章 文中子门人及其交游考	68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68
第二节 重要弟子	75
第三节 一般弟子	83
第四节 交游垂询者	93
第四章 文中子及《中说》的著录与评论	102
第一节 唐人的著录与评论	102
第二节 宋人的著录与评论	110

第五章 文中子新儒学出现的文化背景	130
第一节 儒学的衰落与儒学的玄学化	130
第二节 儒学的佛学化	134
第三节 南北之学与文中子的新儒学	138
第六章 《元经》真伪考	144
第一节 《元经》非阮逸所伪作	144
第二节 《元经》中的避讳问题	151
第三节 从《中说》看今本《元经》	155
第四节 《元经》的版本	162
第五节 《元经》的体例、思想及其他	166
第七章 《续六经》考论	173
第一节 《续诗》与《诗经》	175
第二节 《续书》与《尚书》	186
第三节 《易赞》与《周易》	197
第四节 《礼论》与“三礼”	214
第五节 《乐论》与《乐记》	228
附录 文中子年谱	236
参考文献	260
后记	264

绪 论

文中子王通,隋代大儒,他以儒学革新者的面貌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从儒学发展史来看,文中子是从汉晋经学向宋明理学过渡的关键人物,他以不同于传统经学的学术形式,在隋末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中晚唐形成了儒家子学的复兴。

文中子新经学的出现,既是统一国家的政治需要,也是儒学本身发展的需要。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儒学先是被玄学化,继而又被佛学化,南北割据,经学又有南学与北学之分,儒学的正统地位被弱化了,而且又掺杂了其他的思想进来。隋统一后,儒学思想应该统一,文中子就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要行周孔之道。在儒、释、道合流的大文化背景下,文中子要复古,但他并不走两汉今古文经学的训诂释经的路子,而是要直承孔子的“六经”之学,作了《续六经》。在隋及初唐,人们尚未发现文中子之学的价值,故其书的流传受到局限,逐渐散佚不全。但他的思想到后来毕竟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而且直接影响到了儒家子学的发展,宋明理学诸儒兼具经学的特点,皆源于文中子之学。在南北朝到唐的学术演变过程中,文中子具有变革性的作用,并对中国以后学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许多学者在他们的论著中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中子。宋代学者高似孙在《子略》中,以学术史的眼光给文中子以突出的地位,他说:“呜呼,盖自孟子历两汉数百年而仅称扬雄,历六朝数百年而仅称王通,历唐而三百年而唯一韩愈,六经之学,其著于世者若此已是匪难乎。”^①《三字经》中亦有“文中子,及老庄”。可见在宋人的意识中,文中子之影响非同一般。当今著名学者

① 《史略·子略》第64页,《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霍松林先生,在给《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一书所写的序中说:“王通是孟子以后最大的一位儒者。”^①所以,对在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这么重要影响的人物进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

自唐以来,学者们就非常重视对文中子的研究,但是真正深入研究的著作并不多,主要原因是成书于唐初的《隋书》只字不提文中子,致使疑信者参半。近人研究史学与哲学思想,亦有疑之而一字不录者,如周谷城《中国通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岑仲勉《隋唐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等;有虽信之,而寥寥数语、论而不证者,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有大言坐实,谓其书足以“表现一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者,如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虽然在文中子研究中有不同的声音,但今天的大部分学者基本上还是肯定文中子其人其书的。关于文中子的研究历史,下面作简单回顾。

一、唐代有关文中子的文献记载

在这一历史时期,人们逐渐认识到文中子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并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还未有真正的研究。这一阶段属文献著录时期,记载文中子事迹的主要文献有:

1. 初唐:文献中主要是王氏家人、门人和友人对文中子的记载。如王绩《游北山赋并序》、《负苓者传》、《与陈叔达重借隋纪书》、《答处士冯子华书》、《仲长先生传》、《答程道士书》,王勃的《倬彼我系》、《续书序》。另外还有杨炯的《王勃集序》,吕才的《王无功文集序》,陈叔达的《答王绩书》,薛收的《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杜淹的《文中子世家》。初唐之后有一百多年,文献中不见文中子的记载,其中原因亦如墨学的流传。章太炎在《蓟汉昌言·连语一》云:“墨家至汉不传,……则墨亦并入儒矣。”^②即墨家不单独成派并不等于其思想的消失。文

^① 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2页,《大陆地区博士论文丛刊》,台湾文津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

^② 章太炎:《蓟汉昌言》第93页,《新世纪万有文库》,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中子不显于初盛唐,亦同此理,究其因一在于文中子思想的超前性,或者说与时代潮流不相符;二在于初唐与盛唐尊道、重佛,又崇实用之学,故王氏之学不显于其时也。

2. 中晚唐:这一时期的文献记载较多,文中子引起人们的注意是在唐王朝出现衰败之象后才有的,在他们为了疗治社会疾患、寻找出路的心态下,发现了文中子通经致用的价值。文中子的本乎道、重政教、宗经复古的思想也就成为天宝以后创作理论上的主张。在这一阶段,多是肯定文中子,记载文中子的主要文献有刘禹锡的《唐故宣歙池等州都团练观察处置使宣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赠左散骑常侍王公神道碑》,李翱的《答朱载言书》、《读文中子》,有关刘蕡读《文中子》的记载(见北宋初钱易《南部新书》),裴延翰的《樊川文集序》,皮日休的《文中子碑》、《请韩文公配饷太学书》,陆龟蒙的《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司空图的《文中子碑》、《三贤赞》,徐鉉的《舒州新建文宣王庙碑序》。刘昫的《旧唐书》记载文中子的事迹比较分散,《王绩传》、《王勃传》、《王质传》、《隐逸传》、《文苑传》、《经籍志》等都有记载。在《旧唐书·王勃传》中说文中子“自有传”,应该是另有专传,但实际却无传。这种现象在《二十四史》中屡见不鲜。《旧唐书·玄宗纪》云:“开元二十九年崇玄学,置生徒,令习《老子》、《庄子》、《列子》、《文中子》。每年准明经例考试。”这里的“文中子”应为“文子”,《旧唐书》所记有误。这一时期的文献除了记载文中子的事迹,还对他的学术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皮日休在《文中子碑》中云:“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较其道与孔孟,岂徒然哉?设先生生于孔圣之世,余恐不在游、夏之亚,况七十子欤?惜乎!德与命乖,不及睹吾唐受命而歿。苟唐得而用之,贞观之治,不在房、杜、褚、魏矣!……先生之功,莫之与京。”^①

在唐代的这些文献中,既有记王通其人的,又有记其书《中说》、《续六经》的,也记载了后人疑其伪书而流传至今的《元经》。关于文中子的文献记载,一为文中子的后人所记,一为其他文人学者所记。

^① 皮日休:《皮子文藪》卷四,第3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1月第1版。

在唐从未有人怀疑过文中子其人其书的。这些翔实的文献,都为我们后面的辨伪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宋代的文中子研究

宋代的文中子研究属注释、整理和简单评价时期。儒家学者对文中子与《中说》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由于他们未能从考据方面解决文中子与《中说》的真伪问题,因而也就未能取得大部分学者的信服,不过他们从思想价值和学术价值方面肯定了文中子思想的意义。

1. 宋初人们对王通其人其书是并不置疑的。柳开自二十岁起景仰文中子王通及其著作,曾多次易名,旧号“东郊野夫”,后改为“补亡先生”,不久又易名柳开,字仲涂。他自述道:

补亡先生,旧号东郊野夫者也。既著野史后,大探《六经》之旨,已而有包括扬、孟之心,乐为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遂易名曰开,字仲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将开今人之耳目聪且明也,必欲开之为其涂矣,使古今由于吾也,故以仲涂字之,表其德焉。^①

比柳开稍晚的石介(宋初三先生之一)是宋代理学的启迪者,他亦未怀疑过文中子的存在。他说:“文中子以《太平之策》十有二篇干隋文帝,不遇,退居河汾之间,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②在欧阳修、宋祁所修撰的《新唐书》中,《王勃传》、《王质传》中记有文中子,《隐逸传》、《文艺传》亦有记载。新旧《唐书》不为文中子立传,是因为文中子不属于唐人,他卒于

① 《四库全书》第1085册,集部24,编年类,第247页,《柳河东集》卷二《补亡先生传》。又见《宋文鉴》卷二百四十九。

② 《四库全书》第1090册,集部29,别集类,第279页,《徂徕先生集》卷十四《与土建中秀才书》。

隋大业十四年,尚未入唐。^①而《隋书》不为文中子立传,清人王士禛以为:“唐初修隋史,不为文中子立传,千古疑之。”^②《隋书》不为文中子立传,唐史补之,犹汉末人未入《后汉书》而入于《三国志》。至于《隋书》只字未提文中子,其原因有二:一是杜淹与长孙无忌有矛盾,王氏兄弟亦皆不用,修《隋书》者陈叔达、魏征皆惧长孙无忌,因长孙乃皇后之兄,且对唐有佐命之勋,功居第一;再者叔达、魏征在文中子弟子中关系稍远,其内心未必愿为弟子,此不为文中子立传之由。但由此引起人们对文中子其人其书的猜疑。

2. 给文中子以应有的学术地位。程颐门人:“问王通,曰:隐德君子也。当时有些言语,后来被人傅会,不可谓全书。若论其粹处,苟非荀、扬所及也。”^③朱熹在《近思录》、《朱子语类》等多处言及文中子,评价亦较为公允,他说:“王通极开爽,说得广阔。缘它于事上讲究得精,故于世变兴亡,人情物态,更革沿袭,施为作用,先后次第,都晓得,识得个仁义礼乐都有用处。若用于世,必有可观。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于大体处有所欠缺。”^④“王通见识高明,如说治体处极高,但于本领处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处,皆不理会。”^⑤陆九渊对文中子的评价是单刀直入的,他说:“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⑥史学家司马光见正史未为文中子立传,故作《文中子补传》;^⑦以补其缺。但在学术史上,司马光对文中子持一种谨慎而又重视的态度,他虽然对《隋书》不载文中子一事疑惑不解,但仍然采取了《中说》及其附录《文中子世家》中的材料。他将“诣阙献

① 大业十四年(618)三月,炀帝被弑于江都,此后又立隋恭帝。而文中子卒于是年五月。也就在同年(618)五月,李渊迫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改元武德。关于文中子卒年各家说法不一,详见本书后附录的《文中子年谱》。

② 《香祖笔记》卷三,《明清笔记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12月第1版。

③ 《二程遗书》卷十八《伊川先生语四》,第28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④⑤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七《战国汉唐诸子》“问荀扬王韩四子”条,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⑥ 《四库全书》集部95,别集类,第1156册,《陆九渊集》卷二十四《策问》。

⑦ [宋]吕祖谦:《宋文鉴》,齐治平点校,一百四十九卷,第2095页,中华书局1992年3月第1版。

《太平十二策》”等事迹,以及王通与弟子贾琼的一段对话,编入《资治通鉴》。司马光以史学家特有的眼光,敏锐地觉察到文中子在历史上的真实存在及其文化意义,所以就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文中子,^①并撰写了《文中子补传》,《补传》云:“余读其书,想其为人,诚好学笃行之儒。惜也,其自任太重,其子弟誉之太过,使后人莫之敢信也。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故采其行事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著于篇,以补《隋书》之缺。”^②在宋以后的史学家中,唯有司马光给文中子以重视。现代史学家陈寅恪亦加重视,但相比之下,陈寅恪更多的是采取一种审慎的存疑态度,他说:“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③但在诗文中,陈寅恪对文中子极为仰慕,视之为自己生平的典范。宋人高似孙在《子略》中记载王氏著书及卷数,并在学术史当中给以崇高的地位。^④《宋史·儒林传》记陈亮“其学自孟子之后惟推王通”。龚鼎臣《东原录》于文中子有载。王明清《挥麈录》云:“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欧阳文忠公、宋景文修《唐书》,房、杜传中,略不及其姓名。或云:‘其书阮逸所撰,未必有其人。’然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而刘禹锡作《王华卿墓铭序》,载其家世行事甚详,云‘门多伟人’,则与书所言合矣,何疑之有?又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于《文粹》。”^⑤张洎《贾氏谭录》云:“吴箕常谈孔子不喜与人辩,孟子好与人辩是非,文中子复不喜与人辩,其学孔子之道者欤!或曰:孟子之时,冀以明其教也。文中子遭乱世而退河汾,宜乎不为之辩也。”^⑥刘祁的《潜归志》,亦有赞美之语。宋人言及文中子的还有苏轼,其文见《宋文鉴》卷一百一十一,以及刘弇的《龙云集》(卷二十八),李觏的《读文中子》(《李直讲集》),孙复的《与张洎书》(《宋文鉴》、《宋元学案》)。《崇文总目》有“《中说》十卷”。《宋史·艺文志》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九,第12册,《隋纪三》文帝仁寿三年(603),第5599页,中华书局1956年6月第1版,1976年10月上海第3次印刷。

② 《宋文鉴》一百四十九卷。又见《永乐大典》卷6838“王通”条。

③ 《韩愈论》,《金明馆丛稿初编》第29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④ 《史略·子略》卷四,第65页,《新世纪万有文库》。

⑤ 《挥麈录》前录卷三,第20页,《历代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⑥ 《永乐大典精编》卷六千八百三十八,第1737页,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载：“王通《元经薛氏传》十五卷，王通《文中子中说》十卷，宋阮逸注，宋咸《过文中子》十卷，司马光《文中子补传》一卷，龚鼎臣《中说解》十卷。”

3. 文中子注本的出现。对文中子其书的注释，有阮逸的《中说注》、《元经注》，宋人王观国承认阮逸注《文中子》，但是他不赞同阮逸给每篇命名的做法。王观国《学林》云：

阮逸注《文中子》，又作叙篇，……阮氏不察，乃以《文中子》十篇作《叙篇》，曲折傅会而为之说，则误矣。今世传《杜子美诗集》，第三十卷首二十余篇，皆以两字为题，如《宿昔》、《能画》、《斗鸡》、《鹦鹉》之类，皆非本题，详其诗意，皆追忆开元之盛，叹天宝之乱，子美初必各自有题，后之编类者失其本题，但取篇首二字为题耳，恐误后生学诗者。^①

暂且不管他对《文中子》题名的看法，起码他是承认阮逸注过《文中子》的。龚鼎臣亦有注本，龚注本以甲乙冠篇。石介有《送龚鼎臣序》云：“山阳龚辅之，学为古文，问文之旨于鲁人石介，……”^②宋尤袤《遂初堂书目》四十五载：“文中子《中说》，龚辅之之注《中说》，薛氏注《元经》。”^③南宋朱熹在与弟子对话中云：“尝考文中子世系，并看阮逸、龚鼎臣注，次日因考文中子世系，四书不同，殊不可晓。”^④陈亮见龚氏注本与阮氏注本有异，随后即类次《文中子》。《类次文中子引》云：

余以暇日，参取阮氏、龚氏本，正其本文，以类相从，次为十六篇，其无条目可入，与凡可略者，往往不录，以为王氏正书。^⑤

① 《学林》，田瑞娟点校，第48页，中华书局1988年第1版。

② 《四库全书》集部29，别集类，第1090册，第312页，《徂徕集》卷十四。

③ 《四库全书》第674册，史部432，目录类，第460页。

④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全8册）王星贤点校，卷一百三十七，第3260页，中华书局1986年3月第1版。

⑤ 《陈亮集》增订本，邓广铭点校，第249页，中华书局1974年版。

龚氏注本惜已不存,但《困学纪闻》所引,略存数条,李格非为龚本写有跋语,其文云:“龚自谓明道间得唐本于齐州(今山东济南市)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余处。”^①此亦证《中说》阮注本不伪。叶大庆《考古质疑》卷五驳《中说》非阮逸作甚力。

4. 文中子研究中的疑伪思想。宋人于文中子有疑者,实始于司马温公,其后有洪迈、晁公武、朱熹、王应麟等。洪迈《容斋随笔》、张昞《云谷杂录·读文中子》、王应麟《困学纪闻》中的《读文中子》、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疑其书有不同程度的伪。这一方面是《中说》非文中子自著,属家人及弟子所为,书本身也存在错乱之处;另一方面是《隋书》未为文中子立传,故而导致人们对文中子的怀疑。论者有以《中说》误者,其实未必有误,徐朔方先生在《王通门人辨》一文中,已驳《郡斋读书志》卷三之误和宋邵博《闻见后录》卷二之误。^②霍松林先生在《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的序文中也说:“《隋书》不载王通,是由于王凝获罪长孙无忌。”^③宋人治学,好思辩,标新立异,不惜妄语。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说:“宋人经学,其有不守陈义,自辟新术,非一家一派所得而囿者。”又说:“宋儒治经,不惟喜新奇为异于前也,尚有二事颇足以启后人之议,其一曰疑经,其一曰改经。”^④宋中后期以至明,本来就学风空疏,学者束书不观,好立异自新,故于宋人之言应慎之。宋人章如愚从文中子《赞易》、《续书》、《续诗》、文中子言《周礼》、《元经》等方面进行了考证,^⑤虽然材料多来源于《中说》,但亦有发明之处。对于《元经》的真伪,学者们所认为的有力证据是避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人们多沿用陈振孙的说法。陈振孙谓:“唐神尧讳渊,其祖景皇讳虎,故《晋书》戴渊、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于传称戴若思、石季龙宜也。《元经》作于隋世,乃亦云若思,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部,卷三十六,第854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浙江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第5页。

③ 《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第2页。

④ 《中国经学史》第十章《宋之经学》,第119页,上海书店1984年版。

⑤ 《群书考索》前集卷一,六经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影印明正德本。

逸之心劳日拙,盖不能自掩矣。”^①翻检明万历刊本《汉魏丛书》所收的《元经薛氏传》,发现经和传中也有不避讳的现象。

三、明清时期的文中子研究

金元时期关于文中子研究的材料很少见到,只有元初的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中集有前朝学者对《中说》及《元经》的评价。

1. 明代的文中子研究。明代对文中子王通的研究,既有公允之言,亦有怀疑之辞。王阳明《传习录》和弟子的问答中,对文中子既有颂辞,又言其“拟经”,但亦云“拟经恐未可尽非”。宋濂在《诸子辨》中不相信《中说》为阮逸伪作,但认为是文中子之子所为。李贽在《藏书》(卷三十三)中记及文中子之事迹、著述和弟子,在《史纲评要》(卷十六《隋纪》)中记了文中子教学之事。崔铣有《中说考》,今《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儒家类第933册收有明河汾书院刻本,其书现藏南京图书馆。可以说《中说考》是在阮、龚作注之后,真正进入研究的一部著作,其序存在《洹词》卷五。他在序中分析了文中子其书为何流传甚难,为何知者寡而罪者多(如僭经、拟孔子、学不师圣、仿《论语》、文又驳杂)。崔铣在序中说:“铣为别白其词,权量其旨,类分为三:曰内,曰外,曰杂。”^②与宋陈亮的《中说》类次意同。莫友芝的《邵亭书目》载《中说考》七卷,说:“明崔铣撰,与此文所记,凡二十篇不同。”^③《永乐大典》卷之六千三百三十八中收有:司马光的《文中子补传》,司空图的《文中子碑》,皮日休的《文中子碑》,宋释契嵩的《文中子碑》。还有一些是从书、志中摘出的有关文中子的论述,如《能改斋漫录》,《元一统志》,《河中县志》,《司空表圣文集·文中子碑》,《皮日休文集·文中子碑》,宋释契嵩《镡津交集·文中子碑》,《书文中子传后》,《资治通

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四部正伪》上,第300页,《历代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② 《续修四库全书》第933册,子部儒家类,第487页。

③ 《续修四库全书》第926册,目录类,见莫友芝的《宋元旧本书经眼录》三卷《附录》二卷。

鉴·隋高祖纪》，孔平仲《杂说》，《王福時记》，郑内翰《郑溪集》，《朱子语续录》，《山堂考索》，《黄氏日抄》，龚鼎臣《东原录》，《贾氏谭录》，《杨龟山语录》，《程氏遗书》，《史子朴语》，《容斋续笔》。另外，《永乐大典》在《事实》的题目下，分道德、学业、礼乐、教学、言语、著书、献策、不仕、通类等九类，从《中说》、《世家》、司空图《文中子碑》等文中，摘出一些文中子的事迹与言论，以实其类。关于《元经》，从宋到明的学者们多以为伪，胡应麟在《四部正伪》中的观点亦渊于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鲜有新说。

2. 清代的文中子研究。清代学人对文中子其人其书的看法，疑信参半。所论者有顾炎武的《日知录》，俞正燮的《癸巳存稿》（卷十四），俞樾的《读文中子》，朱彝尊的《经义考》（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已辨其非），周中孚的《郑堂读书记》（卷十六），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列为伪书，李慈铭的《越縕堂读书记》，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校讎通义》，《四库全书》、《四库总目提要》等，以上文献所论比较客观。但是清代辨伪大家阎若璩在《潜丘札记》中引《中说》多至十余条，无一语及其真伪问题。

四、近代以来的文中子研究

1. 片断式研究：即在其他的书或文章中论及文中子的，这方面的著作有梁启超的《历史研究法·史料辨别》，章太炎的《检论·案唐》、《蓟汉三言》。有的书列章或节来讲，研究王通哲学思想的有：日本渡边秀方的《中国哲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台湾李世杰、沈秋雄的《中国历代思想家》（二十）。刘尉林、赵宗正主编的《中国儒家学术史》（第二十二章），主要讲王通的儒学思想，与此相同的还有许凌云的《中国儒学史》（隋唐卷）。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主要介绍文中子的哲学与新经学思想。研究与王通相关的文学现象的有：谢无量的《中国文学史》，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贾晋华的《唐人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以比较大的篇幅来研究河汾作家群，通过对这一作家群及作品的稽考和评述，来探讨它对隋唐之际文学发展